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文化、社會與空間：評安東尼·金三本書及泛文化論

Culture, Society and Space: A Critique of Anthony King's Recent Books and Culturalism

doi:10.6154/JBP.1987.3.010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3), 1987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3), 1987

作者/Author：陳志梧(Chih-Wu Chen)

頁數/Page：197-20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7/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1987.3.010>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文化、社會與空間：評安東尼·金三本書及泛文化論

陳志梧*

CULTURE, SOCIETY AND SPACE: A CRITIQUE OF ANTHONY KING'S RECENT BOOKS AND CULTURALISM

by
CHIH-WU CHEN*

Colonial Urban Development: Culture, Social Power and Environment, Anthony King,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6, 328 pp., US\$?

Building and Society: Essays 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thony King (eds),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318 pp., U.S.\$19.95

The Bungalow: the Production of a Global Culture, Anthony King,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310 pp., U.S.\$ 50.00

摘 要

本文為安東尼·金最近編著論建築與城市的三書的評論，主要集中在方法論上討論，尤其是其在1976年的《殖民都市發展》中所使用的「泛文化論」觀點。論者首先在空間理論發展的歷史脈絡中定位金之研究的意義及其與不同認識的關係，其後指出作者所使用之方法所交雜的「泛文化論」與「依賴理論」的吊詭，從而追溯「文化」這觀點的歷史發展、意指，以及其與人類社會實踐的關係，並以此批評「文化」這個觀念只是一種籠統的人文主義觀念，不是成為人類社會，甚至空間研究的概念和工具。最後，論者指出作者在後兩書中的方法論轉變，使我們看到一個研究都市形式與建築類型的新取向。

ABSTRACT

The paper is a review of Anthony King's recently published books: Colonial Urban Development (1976); Building and Society (1980); and The Bungalow (1984). The central discussion is focused on methodological level, especially on the notion of "culture" as an approach of spatial research, which was applied in his first book about the City of New Delhi.

The critic is trying to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a paradox in cooperating idealistic notion of "culture" and materialistic approach of "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King's method. By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tion of "culture" from ancient Greeks' down to that of Boasians', the author shows that "culture" is but a humanistic notion either to distinguish human being from other species, or, one society from the other. Afterwards,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notion is incapable to be used as a concept of spatial study, the author tries to locate the notion in the sphere of human prax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notion, human spatial practice, and soci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Finall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shifting of approaches in King's last two books towards Foucaultian method and "dependent urbanization" gave us a new direction of spatial research.

民國76年 2 月 7 日收稿

* 台灣大學土木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Manuscript received on February 7, 1987.

*Ph. 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安東尼·金 (Anthony King)，一個英國的社會學家，布倫乃爾大學 (Brunel University) 社會與環境研究資深副研究員 (Associate senior research fellow)，同時任教於倫敦的大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發展計劃組。曾在印度住了 5 年，其間擔任印度理工學院 (Ind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人文與社會科學客座教授，並從事一系列有關英國殖民國間印度城市與住居的變遷研究。研究成果先後凝聚成 1976 年的《殖民都市發展》、1980 年其所編纂的《建築物與社會》、以及 1984 年之《小別莊》。在此三書中金從社會學角度探討了實質環境的變遷，從方法論來看，《殖民都市發展》受到當時風行之依賴理論與阿蒙·拉普普 (Amos Rapoport) 的影響，把城市當成社會生活表現，認為殖民地城市從文化的觀點來看，表達了在殖民依賴關係下文化接觸所形成之新文化形式。而到了《小別莊》時，作者則從伊曼紐·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觀點，以政治經濟學分析英國殖民時期所發展出來的新居住空間理念——「小別莊」居住類型的形成，將之視為相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空間意識形態，並討論其在印度、英國、北非、美洲大陸及澳洲等不同脈絡下的變化，所造成的全球性文化生產。這種空間形式的社會學探討，在實質環境歷史變遷的研究上有其一定的貢獻。為了解金的研究的知識意義，我們有必要從其產生之時代背景與當代有關空間研究的學術思潮中找尋其歷史的定位。

在傳統學院的分工下，有關實質空間歷史的研究一向屬於建築史的範疇，是建築歷史學者的任務。建築史從十九世紀起，伊始成為學院教育的一個類科。其形成與現代意義之建築師的崛起，以及「建築」這個學院字彙的歷史界定有唇齒的關係，在在都是伴隨著近世西方社會新興的「人」作為一個主體認定的結果。建築史的論述 (discourse) 本身也是歷史的產物 (註 1)。因此，傳統學院建築史研究的對象，也受到這個學科產生時之學院意識形態條件限制，被界定為那些壯麗的、紀念性的、與眾不同的建築物；另一方面，由於早期建築史家多為從業建築師所兼任，從而，建築史的論述方式也受限在這些專業人員所關心的三個方向，即：實用的、歷史的、和美學的向度 (Watkin, 1980: viii)。而且這三個向度在學科的傳統研究中也都侷限在一個偏狹的取向。所謂實用的乃在找出那些建築物被建造、何時建造、其設計者和業主之名字；所謂歷史的指這些建築物為何被建造；而美學的向度則專注在這些個別建物之視覺及形式之描述，以及其與其他建築物之差別和原因之解釋 (Watkin, 1980: vii - viii)。因此，傳統建築史論述，一則忽視了那些構成人造環境最大部份的「慣習建築」 (conventional buildings)；同時，也

未能將人類實質環境的建構行動、使用、以及其空間形式放在其歷史脈絡中以探索它們與該社會存在的關係。

空間建構乃人類生產實踐的一個部門，與其他物質生產互依 (Castells, 1980: 115; Teymer, 1984: 231) 同時社會也僅存在於空間、時間中 (Giddens, 1985: 265~295)。因是，建築與城市形態之營造，不管從共時性的空間形式結構，或歷時性的歷史變遷來看，都可當成社會事實 (social fact) 與在其間活動之社會一齊成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

然而，社會學在近世紀之崛起，受到十七世紀以後之社會脈絡，即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社會「失序」影響。從史賓塞以降的三大社會學傳統：馬克思所影響之批判社會學，涂爾幹所影響之結構功能社會學、以及韋伯影響的歷史詮釋社會學，都環繞在工業革命後，現代資本生產方式興起所造成的人類關係的辯爭上 (Ritzer 1983: 3-50)。這三大學術流派的奠基者雖分別，直接或間接地，關心著體現人類社會關係的空間條件。不過其主要的論題卻不約而同地聚焦在那些或潛藏的、或表面的社會關係結構上：如馬克思所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商品生產關係所造成的人的異化與社會階級間的對抗；如涂爾幹討論的從社區到社會變遷過程中之社會機械連帶到有機連帶間的轉化；或韋伯所關注的資本主義社會之權力合法化和官僚體系問題 (Ritzer, 1983)。同時也因為近代科學哲學自笛卡爾以來的假設，把人這個主體從外在的客體中分離出來，使得社會學這個新興的學科忽視了社會與空間的緊密關係，孤立地看待其傳統之研究主題：經濟的、政治的、宗教的和親屬的關係，而使得空間這個課題一直為社會學所忽視。至於當前以研究「文化」為主要論述的人類學，也因其學門之歷史地產生與十九世紀急劇成長的殖民主義之緊密關係，一度為殖民母國涵化其殖民地子民的工具。同時由於與社會學間的裙帶關係，造成了其論述，不管在對象與方式上，都割裂地專注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之奇風異俗的描述上。因此，雖遠在十九世紀時已有摩爾根與緬因等人對空間的研究 (Morgan, 1877; Maine, 1875)，馬克思、韋伯對現代城市之興起與涂爾幹對宗教空間之討論 (Saunders, 1981: 14-47)，空間這個範疇卻長久地被社會學與人類學所忽視。

兩次大戰期間，美國面對大量移民進入城市，這些移民的涵化成為社會生產的關鍵課題，因而有一些社會學家以芝加哥為基地作了一連串的研究 (Park, Burgess and McKenzie, 1967)。其中，派克 (R.E. Park) 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從生物的、文化的、類的特性來解釋都市社會 (Gottdiener, 1985: 27-28)；伯吉斯 (E.W. Burgess) 以德國古典都市經濟學家蒙·圖能 (Von Thunen

與阿佛烈德·韋伯 (Alfred Weber) 的區位理論發展了都市形式之向心模型 (Gottdiener, 1985: 30)；而馬肯吉 (R.D. McKenzie) 則以達爾文——史賓塞的觀點把城市社會當成一個對應於社會內、外部要求而自我調適的有機體。但是，芝加哥學派美國中心主義的地域宗派看法、對文化和發展理論的假設、以及與經驗現實之不吻合，使得「都市社會學」未能形成嚴整的理論建構，反而陷入了思想的貧困中 (Castells, 1976: 69)。然而，由於當時美國對世界的經濟、政治、甚而知識的支配，使得當時的歐洲、甚至後來全世界都籠罩在芝加哥學派的迷霧中。

隨著美國從而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發展與危機的漲落、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 (statism) 陣營之對峙，西方的學術思想也起了幾個重大的變化。1960年代的都市危機所掀起的反體制社會運動狂飈無疑成爲學術再思考的轉捩點。此中反省相當複雜，有強調人文精神的現象學對實證主義的撻伐、批判理論的再出發、西方知識界之虛無轉向……等 (爲本文之目的我們僅提及與論題有關者)。這個激烈反省對美國建築學術的波及，表現在空間使用價值的再提出，並以此來檢驗現代建築運動理想在美國社會中 (甚而全球) 的形式主義變形，與空間商品化所造成之環境危機。在一片反文化風潮的鄉愁氣氛中，再度勾起某些非學院出身的研究者對昔日鄉土的懷想，因此，在傳統建築史論述之外，伯那多·魯道夫斯基 (Bernard Rudofsky) 的《沒有建築師的建築》(1964)，拉普普的《住屋形式與文化》(1969) 等對無名建築的討論成爲一時之經典。尤其是拉普普那本將住屋形式視爲“文化”產物的小書影響更大，爲後來相關研究開創先機，成爲實質環境「泛文化論」之奠基石。

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擴張，也使市場經濟爲導向的生產方式更植於本爲殖民地而新近獨立的民族國家中，進一步地，把這些國家的生產納入了新的國際分工，造成了許多國家內部與國際間的衝突。在這個第三世界國家尋求自立的血淚經驗裡，拉丁美洲的社會學家根據他們國家尋求經濟發展、進口替代失敗的具體歷史，向當時盛行的以美國爲首的發展社會學提出挑戰，斥責發展理論中落後國家必須積極參與世界市場才能逐漸上升到開發國家之假設。相反地，這些以拉丁美洲爲主的社會學家個別地從不同角度提出所謂的「依賴理論」，指出：第三世界在積極參與世界經濟之際，同時也受制於「都會——衛星」依賴關係的支配性箝制，從而更導致國家經濟發展之矮化現象 (underdevelopment)，反而，在與世界經濟關係不太緊密的特殊歷史時刻中得以喘息 (Frank, 1971; Dos Santos, 1970)。這個新理論範型，雖有訴諸機械式結構論的缺陷與孤立主義的看法，卻激起了學者對後期資本主義新國際

分工所產生之南北對峙的關注。就在這樣的風氣下，華勒斯坦以法國年鑑學派之研究成果，特別是費南多·布勞岱 (Fernand Braudel) 的經典作《菲律賓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人與地中海世界》(1942-74) 及《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1979) 中所揭櫫的系列史研究與歷史結構爲基礎，追溯了十六世紀以降之資本主義所衍生的世界分工，批評並修正了依賴理論而提出所謂「世界體系」的概念來，即：當今世界存在的乃「一個建立在多文化中的分工體系」(Wallerstein, 1975: 159)，而這個體系中的支配性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Wallerstein, 1979)。

此之同時，在1968年之「五月事件」的怒火刺激下，法國政府財力支持了大學與研究機構對當時法國都市危機的獨立研究，以作爲政治危機處置之參考。這些研究摒棄了先前美國都市社會學的功能典範，嚐試從19世紀批判理論的傳統來處理都市問題。至1970年這些研究已足以支持《空間與社會》(Espace et Sociétés) 這個建築與規劃雜誌，1973年這些研究更以專書《都市研究》(La recherche urbaine) 形式出版，形成當代都市研究之重要思潮 (Pickvance, 1976: 1-2; Gottdiener, 1985: 71)。這支源自路易·阿圖塞 (Louis Althusser) 的結構主義批判理論對城市之閱讀，乃把城市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來討論：如，以曼奴·卡斯提爾 (Manuel Castells) 爲代表這支即將城市視爲社會生產、交換、消費與管理之表現，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同階級在物質的、意識形態對抗下的產物 (Castells, 1980, 1983; 亦見於 Saunders, 1981: 159-218)。批判理論空間研究之另一支以美國地理學家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爲代表，從政治經濟學之資本累積與階級對抗來探討現代都市，把資本主義城市視爲資本累積、擴大再生產、支配關係再生與階級對抗的空間 (Harvey, 1985; 亦見於 Saunders, 1981: 219-231)。批判社會學由於在理論建構的層次上，把城市社會與空間過程放置在一個更寬廣的人類社會與歷史變遷中來討論，並在經驗的層面上可用來詮釋現實世界，因之，在當今都市、甚至更大的區域空間研究中躍然成爲顯學。

從以上空間研究流派發展背景的討論，我們已可進而檢視安東尼·金的方法論。

在《殖民城市發展》(1976) 中，金借用拉普普的看法 (Rapoport, 1969)，認爲「文化」是人與環境關係研究中的首要變數，因爲社會中的人在解決許多人類共同需求，如：食物、庇蔭、繁衍、社會化……等問題，其所採取的方式是一個「以「文化」爲中介 (mediation) 的過程」(1969: 12)。空間亦然，是該社會與文化之「概念模型」的反映，「而這些概念模型對結構該社會世界 (

social world)言有其根本的重要性」(1976:13)。他認為都市空間使用(spatial usage)乃該文化的物質造物(material artefact),表達了該文化承繼中的認知範疇、象徵、與使用(1976:20)。金並延伸了堅納·阿布魯(Jannet Abu-Lughod)的「新興國家的主要城市不只是個統一的城市,而是在建築上與社會上有別兩個城市在實質上疊合」的看法(註2),並結合了依賴理論之「都市——鄉村」依賴概念,認為殖民城市是在「支配——依賴」關係下不同文化接觸所衍生之新文化的產物。因此,「殖民主義對非西方地區都市發展的衝擊可視為一個西方的(文化地說,英國)、資本主義的、工業的(即:一種經濟技術的秩序)和殖民的(即:政治支配)權力衝擊」(1976:25)。從而,研究或解釋殖民都市之社會、空間結構最根本的乃在於掌握其中的文化、技術與殖民主義之權力結構等要素(1976:26)。他繼而闡明這三要素的內容:所謂「殖民主義之權力結構」指的是支配——依賴關係之殖民主義概念。這個關係表達在兩層次,在國家層面,殖民地對「中心」或「都會」的依賴造成卡斯提爾所謂的「依賴都市化」現象(Castells,1980:47-49);以及在城市層面之不同種族的隔離以利統治(1976:38-39)。「技術指的是對能源使用的結果,其本身亦為『文化』的產物,同時也是政治體系所賴以運作者」(1976:25);而「文化」則是「指導都市使用之認知、結構和使用的價值體系,這些價值體系合法化了宗教、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而這些制度又決定了實質——空間形式」(1976:34-35)。由於「文化」是這三要素中之先決要件,因此金以此書中第三章全部篇幅來討論。作者借用戈登諾(Goodenough)的觀念指出:「文化」意指「文化所圍繞之認知的、信念的意義及象徵組群,是個體被特殊文化群接納並在其中運作所必備之信念與知識」(註3)。金同時又借用了史密斯(Smith)的看法認為制度(或機構)(institutions)是「文化」之核心,是活動、群體、規劃、意念與價值之表現形式,因此從「文化」的觀點來研究都市形式可把制度(或機構)當作檢驗的工具。而對其研究言這些制度包括:政府、親屬、宗教、經濟制度,社會制度、遊憩模式等(1976:44-57)。

金的這個理論框架,從理論的層面來看,多少是一個奇怪的組合。他在結構論的「支配——依賴」關係結構上,以一個芝加哥學派的「文化」觀點,對城市形式進行英國人類學傳統所發展出來的「制度」概念的功能分析。雖然這個泛文化論的理論架構比起同時代的技術決定論和短視的經驗主義已然向前跨進一步,但我們仍不禁地從方法論的層次質疑:將這些來自不同假設的理論安插成一個研究架構會不會有基本預設上的吊詭(paradox)?在依賴

理論的框架上,「文化」這概念是否有其必要性?能否用其他概念取而代之?

避開依賴理論在其原始理論脈絡中的簡單機械論與孤立傾向的疑點不談,用在一個相對短暫的歷史時刻中來處理「都會」與「鄉村」之結構性依賴原本也無可厚非。可是依賴理論本身的預設乃建立在中心國家與邊陲民族在資本主義經濟運作過程的相互依賴關係,亦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資本運作邏輯之上。這個假設的背後是殖民母國與殖民地的關係立基於前者對後者超額剩餘價值榨取之經濟掠奪上,因此,資本累積乃是此結構產生的基本動力,同時也是殖民地城市空間再結構最根本的原因(Castells,1980:44-49)。而殖民地城市作為這種經濟依賴關係運作的空間性條件,如何保證了這個關係的繼續與再生才應是依賴城市形式研究之重點。因此,在這個理論的前提下,借用拉普普所依據的「文化決定論」觀點,把「文化」當成一組信念、價值、認知與象徵體系是人類社會中行爲之主要動力,作為研究工具似乎不能解答上面的問題。作為社會學者的金似乎也警覺到這個缺失,故才再引用史密斯的制度(機構)作為「文化」核心的看法,以解決機構作為殖民統治關係之建立與再生手段的問題。此舉雖然解決了一部份疑點,但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這個研究架構仍有上述學理上的矛盾。因為依賴理論從其基本假設來看採取了一個物質論的觀點,而「文化相對論」則建立在唯心的「文化」自主性預設之上,冒然地將之結合在理論的建構上會產生很大的偏失。

下面讓我們繞道討論「文化」這個觀念(notion)是否是研究人類社會,甚而這個社會所存在之空間的最有效工具。在此之前我應先回顧一下「文化」這觀念產生的歷史過程。

culture這個字出現在紀元前六、七世紀的古希臘,當時它的意義與cultivation相通,指的是農事耕作(如agriculture農業,horticulture園藝,都用相同的字根)。用到人的指涉來自古希臘哲學家普勞特克(Plutarch)著名的譬喻:以農人辛勤地在土地上耕作,使得蠻荒變成沃土,野性變成馴良,來比喻人之所以為人是經由撫育與教養的陶冶(Bauman,1968:19-20)。這個語意到了18世紀西歐資本主義化後才變成了專用在人的涵化之指涉。當時這個字與civilization通用,同時指著一個「實現的境界與發展所實現的境界(an achieved state and an archived state of development)(Williams,1977:14)。後來才有分歧:civilization意謂著外部的發展;而culture意涵著人本身的內部的、精神的進化,特別是有關藝術、宗教、制度以及意義和價值之實踐(Williams,1977:14-15)。這個看法實則深受歐洲啟蒙時期對「理性」的看法

，以及當時達爾文的進化論影響，把人類社會和人本身的「精神」發展看成一個進化的過程，是理性心靈之階段性的意識創造，同時可把不同文化安插在一個單一系統層級中。此為19世紀的人類學家如愛德華·泰勒（Edward Tylor）與摩爾根對「文化」之最主要概念（Hatch, 1985: 178-179；亦參見Bauman, 1968: 23）。

本世紀初，德裔美籍人類學家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拒絕了維多利亞時代對理性的看法，而主張「文化」反智的觀點，認為文化不來自人類的生智（raw intellect），而卻來自歷史的偶然，是非理性的，一經造成則有其自主性，成為歷史的絆羈，而這些信念與意義是決定社會形式、甚至於其變遷之最根本的力量（Boas, 1932: 14-15, 1935: 171-172）。這種來自德國歷史決定論影響的「文化」不可化約的看法，曾是現代最主要的「文化」觀念。鮑亞士的學生，後來美國兩個最具影響力的人類學家，露絲·班乃德（Ruth Benedict）和阿佛利德·柯若博（Alfred Kroeber），分別地從不同的角度詮釋了這種唯心的「文化相對論」看法。班乃德承襲了鮑亞士對「文化」非理性的觀點，認為其乃「情緒」的反應，獨立於現實條件之外自行組合，支配人類行為（Hatch, 1973: 84-103；Bauman, 1968: 24）。柯若博雖則部份地修正了鮑亞士之唯心看法，把「文化」分成受制於社會存在利益的「基本形貌」（primary configuration）與「蘊涵於嬉戲驅力的表現與昇華」的「次級形貌」（secondary configuration）（Kroeber, 1952, 1963: 209），並具體地發展了「文化決定論」，視文化為全然統攝個人的「超機體的」（super-organic）力量（Kroeber, 1952: 22-51）。然而，他仍沿襲鮑亞士學派的觀點，賦予「次級形貌」之宗教、神話……等以一個更重要的關注。這三個人類學者雖個別地有些偏倚，但他們都從傳播論看法把「文化」當成各個社會有別，經由傳播而不斷再組合，有獨立運作規律的價值和信念體系。此即雷菲德（Robert Redfield）之理論基礎，後來影響到拉普普甚至金的研究。

柯若博的學生朱利安·史科爾德（Julian Steward）由於受到卡爾·稍爾（Carl Sauer）的薰陶，與卡爾·魏或高（Karl Wittfogel）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水利社會看法（Wittfogel, 1981）而轉向了社會與自然生態體系調適關係的研究。他以一個物質論的觀點把「文化」區分成：「和物質活動、經濟安排有密切關係」的「文化核心」（cultural core），和「大部份決定於文化歷史因素——經由隨機創新或傳播」所造成的「次級形貌」（secondary feature）（Steward, 1972: 37）。與柯若博不同的，他從一個客觀的、實際的觀點強調了「文化」對生態條件適應的重要性，而賦予經濟及生計活動的中心地

位，使「文化」與自然、社會條件再度相連，這個觀點成為史科爾德，及其「文化生態學派」追隨者如安瑞·裴達（Andrew Vayda）、若依·拉波波（Roy Rappoport）、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等人研究的理論基礎。

在這「文化」意義的歷史回溯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字彙原本是一個人文的指涉，用李維史陀（Levi-Strauss）的話來說是一個從「生食」到「熟食」的變化，是社會人之所以別於自然人的過程所經由撫育與訓練的步驟。到了維多利亞時代，在當時之殖民主義意識形態脈絡中，「文化」的意義又變成了西歐中心主義之野蠻的（前資本主義的）社會與文明的（西方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人之內在涵化階段的高下，而當代的「文化」概念，不管是鮑亞士或史科爾德都將之視為由學習而來的指導或界定思想和行為的模式，其大部份構成乃潛藏在意識知覺（conscious awareness）之下，而結構了人類思想與感知的取向（Hatch, 1985: 178）。至於其內涵則或為人文的過程，或為唯心觀點所指的精神、信仰、價值等，或為物質論者所指的包括一切行為模式與政治組織、經濟活動的生活方式，莫衷一是。

然而從一個人類實踐（human praxis）的觀點來看「文化現象」應可理解為「自然的、社會的世界之持續轉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與其所處的世界不斷地交互再調整」（Bauman, 1965: 29）。而這個過程的核心是人類的實踐，就如基曼特·包曼（Zygmunt Bauman）所說的：

「人類實踐在本質上是把『人』的秩序引入物質的自然世界中。其乃在包括著物品生產與分配的社會過程中實現，而就是這些物品服務並滿足人的需求。記號與意義領域，這個領域當今稱為文化，的功能與這個結構間（註4）的關係既是創造的也是再生的。記號與意義的領域提供人們在此結構先決的形式下互動，同時也提供參與者在此形式內互動的工具……。」（Bauman, 1965: 24）

在這種辯證的看法下，傳統人類學，不論是鮑亞士之唯心論，或當今文化生態學之庸俗物質論看法，割裂地對立精神、價值、符號與其物質建構的社會過程，乃是一些宗派的，形式主義的意識形態建構（ideological constructs）。包曼的洞見使我們再度地可從社會生產與再生產（soci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的角度來探討「文化」這個觀念。由於「文化」僅存在社會之中，故我們也因此只能從這個角度來討論。

先撇開文化之自主性（autonomy）這個問題不談，不

管是鮑亞士學派、英國功能學派或文化生態學派，都同意「文化」中的概念、價值或象徵指導了人的思想與行為（Hatch, 1985: 178）。那麼從社會再生產的角度來看，這些概念、價值或意義只有在該社會中存在才有作用，因此也惟有在該社會可持續存在時才發生意義。因此「文化」中的價值觀對思想與行為的指導，消極地必須維繫該社會之現存的結構性關係，積極地並延續這種關係。從社會存在的物質條件來看，這個結構性關係之最終基礎乃建立在社會物質生產的支配性上，不過外顯的形式卻隨不同歷史的、社會的條件而變易；或為宗教關係；或為親屬關係；或為政治關係；或為經濟關係；或為這些關係之不同接合（articulations）。比如，在埃及帝國中物質生產的支配性以一個宗教關係外顯（Godelier, 1982: 26）；澳洲的土著民族則以婚姻與親屬關係作為對自然資源和領域占有的社會框架（Godelier, 1982: 22-23）；古希臘城邦之生產關係則建立在其政治關係之上（Godelier, 1982: 23-24）；在印加帝國，親屬關係「同時具備了政治、意識形態和教育功能，也作為生產關係的元素運作」（Godelier, 1977: 67），坦桑尼亞的易洛克族（Irawq）之宗教儀式同時也扮演者整合政治關係與社會生產的功能（Thornton, 1980）；而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卻分別以生產關係，經驗關係與權力關係的接合以作為社會生產之骨架（Castells, 1983: 305-307）。

職是之故，狹義的「文化」指涉，作為一個特定社會中之意義結構的價值體系，在社會關係結構中最根本的功能用阿圖塞的話來說，是一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經由命名「把個體塑造為主體」與表現了「個體對他們存在的真實條件的想像關係」（Althusser, 1984），從而維持並延續了社會生產與再生產。

是故，從這個觀點來看，一個社會中之意義結構的「價值體系」實不該如傳統唯心學派的片面看法將「文化」孤立於社會物質生產之外。雷斯禮·懷特（Leslie White）甚至認為這種片斷化乃緣於過時之社會體制的保守運動，給予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以意識形態之支持，以維持其與第三世界的關係（White, 1949: 109-110, 160: v-vii）。因為從經驗研究與理論的建構來看，「文化」中的「價值體系」作為維持社會結構之意識形態，是不可能獨立於社會生產之外，雖然其擁有一「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Althusser, 1984）。因為這個潛藏著不同社會之特定生產宰制關係的「想像」乃為合法化社會生產物質的占有基礎，才能維持與延續社會生產與再生產。比如傳統中國社會中之親屬關係既是一個意識形態（或泛文化論者所謂的「價值體系」），同時也是社會物質生產與

再生產的基礎，是結構農村中國的舊封建關係的一部份。前面所舉的不同社會的例子在在也說明這點。或以宗教的意識形態（如古埃及和易洛克）或以政治意識形態來組織社會生產關係（如希臘）。從這個角度來看，批判理論傳統之「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區分（superstructure v.s. infrastructure）乃理論建構上的劃分，而不是物質與精神之對立，因為在現實世界中：

「……思想和語言均屬生產力（productive forces）的必要條件。因此下層結構、上層結構與意識形態的區別並非物質現實和非物質現實之區分。它是不同功能之分別，卻不是基於“實質”（substance）或制度的分野，不管是物質的或其他情況。」（Godelier, 1982: 21）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不僅可看出安東尼·金的早期研究框架上對「文化」所下之定義的形式主義傾向，同時也指出了唯心「文化」理論在認識論上的偏頗。下面我們將再討論「文化」作為一個特定社會中的生活方式，「由慣習、思考和行為模式組成，包括：價值、信仰、表達規則，政治組織，經濟活動等等」（Hatch, 1985: 178）。在這種看法下（如英國之功能主義，美國之文化生態學派等），若撇開其靜態的分類不談，「文化」一詞實則涵蓋了特定社會運作的各個層面。從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角度來看，這個社會過程包括：

1. 建立人與自然關係的物質生產活動；
2. 從這個生產活動所衍生的社會生產關係；
3. 維持這些生產條件所必需的意識形態；
4. 甚至包括進行這些社會生產所必備之工具（如：語言、知識和技術等）；
5. 以及其所製造出來的產品（如：生活物資、空間、和「藝術」等）。

簡言之，在這樣寬鬆的定義下，「文化」一詞可蛻變成該社會之生產方式中的生產關係與意識形態之特殊接合，以及在這個接合中所製造之產品。關於這種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之接合，已在前文中有概略論述，並有許多學者的詮釋（如Althusser et.al. 1968；Godelier, 1972, 1982；Castells, 1983: 305-311等），故不再贅述，在此我們將先討論這些社會產品與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間的關係，並用此來檢視「文化」是否為一有效的概念可用來探討空間形式之建構。

社會產品與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關係中，有關生活物質生產的部門在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所扮演之角色一向是批判社會學研究的主題，自不待我們在此多言。就連我們前

面提起的柯若博的「文化」「基本形貌」的看法也指出這些生計活動是受制於社會存在的利益。史糾爾德的「文化核心」基本上也持著相同的看法，是人受其所處之生態條件制約所形成之物質活動與經濟安排。更甬說如法國人類學家戈德立葉（Maurice Godelier）及梅羅素（Claude Meillassoux）等人的提法：戈德立葉根本認為人類社會經濟關係是社會關係結構之根本力量（Godelier, 1978: 49-126; 1982 etc）；梅羅素也一再指出物質生產對社會生產與再生產之重要性，如：自給自足之農民社會中，由於農作物收穫的延滯所造成的長者與幼者間之層級關係（Meillassoux, 1978a: 127-158; 1978b: 159-170; 1978c: 289-330）。因是，在此我們僅將討論藝術與社會過程之關係，並特別強調空間營造的部份。

「藝術」在古希臘時代與技術、工藝不分都是用同一個字 *techné*，「藝術家」與工匠也都稱之為 *technites*。這點與許多分工比較不明顯的社會十分類似，因為「藝術」的生產對他們來說蘊涵在生活物質生產之中。一直到了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的概念才油然而起，是伴隨著「天才」這個概念產生的。從此「藝術作品」被視為專制人格（autocratic personality）的發現（Hauser, 1968: 61）。伴隨著18、9世紀浪漫主義對主體強調歷史條件的鋪路，與當時隨著工業資本主義而升起之個人主義，一方面「藝術家」獨立於不同社會階級與贊助（patronage）之外工作（Wolff, 1984: 11）；另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勞動分工與勞動異化，使得生活物質生產工作變成片斷的、單調的、缺乏創造性的勞力出賣，相形之下更強化了「藝術創造」的理想性，因而變成了「自由創作」的同義詞（Wolff, 1984: 17-18）。同時，在這樣的社會過程中，「藝術家」乃歷史地被界定為「社會中那些失去被整合位置而邊緣化（marginalised）與孤立化」的「創造者」（Wolff, 1981: 19）；而「藝術」也被社會地界定成特定形式的工作。

根據1978年版《大英百科全書》的定義，「藝術」在最直接與寬鬆的定義下包括「任何人造物品」，這種定義近似古希臘時期的「藝術」觀念；而這個詞的狹義使用卻意指著傳達美學向度的物件，又可分為「專用以產生美感之純藝術（fine art）與為使用而製造而卻傳達美感的實用藝術（useful art）」（註5）。實用藝術，（如：桌子、汽車、燈、籃子等）由於是社會生活物質生產的一部份本來就已納入該社會之生產方式中，故在此我們不另外討論，下面僅將探索「純藝術」作為一個美感的承載者之社會意義。

按照上面的定義：「純藝術」乃產生「美感反應」之作品或作為「美感鑑賞」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下，美感喚

起的過程乃關鍵性的條件。「藝術家」透過特定形式與內容的作品得以傳達或勾起鑑賞者的美感時，「藝術作品」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才得以實現。這時，我們就必須追問這個激起他人「再詮釋」的美感過程如何達成。從「藝術品」製作與消費的角度來看，其中包含了三個步驟：其一為作為製作者的「藝術家」把一定的意念以特殊的方式加工轉化成特定形式之作品；其二為這些作品以特定的交換方式分配到欣賞者的手中；其三為欣賞者對這個作品的解讀（或再詮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藝術品」以一個商品的形式交換（此與過去社會完全不同，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其或直接為政治權力支配關係的再表現，或為宗教支配關係之再表現，不論如何，最後都作為社會既存之宰制關係之再鞏固，用阿圖塞的話來說是一種「文化意識形態機器」），因此其流通也直接地參與在現今支配性的生產方式之中（Vazquez, 1973: 189-196），同時也因為這個介入，而受制於當今「藝術生產」的社會機構（social institutions），因為其決定了什麼人，如何成為「藝術家」，並保障了他們產品推向大眾的路子（Wolff, 1984: 40-48）。在這種情境下「藝術家」和「藝術品」摒棄其具體對象的性質，而以「抽象」的形態參與了社會生產與再生產，因此，它們與其它物質生產並無二致。不過就一個具體的對象來看，「藝術品」又是滿足社會人之表達、溝通與肯定之需的產品。因此，在對特殊意念加工轉化以致於再解讀的過程中，包含了一個針對意義、價值、經驗、感覺之「形式包裝」與對這個包裝之再詮釋，而且唯有在這些意義、價值、經驗與感覺是社會性的情況下才能被再詮釋。難怪馬歇雷（Pierre Macherey）會認為文學中「幻象的語言（language of illusion），乃作家之素材，日常意識形態的媒介與根源」（Macherey, 1980: 62），經由作者詮釋之後，「凝固」（Solidifies）了想像之庸俗語言的外顯意向，而形成「虛構」（fiction）。因此文學既是意識形態的一部份卻又對之採取了距離（Macherey 1980: 61-65）。哈几尼可拉（Nico Hajinicolaou）甚至更直接認為繪畫是一個美學的意識形態，是所謂的「意象意識形態」（idéologie imagée）有意無意地鞏固或批判既存之社會構造（Hajinicolaou 1978）。

至於營造環境的空間建構與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關係更形密切，一方面是由於營造空間支持了社會人之生存與繁衍，是社會生產中勞動力再生產的必要物質條件之一；另一方面更由於空間生產是社會物質生產的一個部門，牽涉複雜的社會分工，同時其生產過程也被納入該社會之特定物質生產方式中。

更有甚者，空間在社會關係再生產上扮演著意識形態延續的功能，用哈几尼可拉的話來說是一個空間化之「意

象意識形態」，具體化了社會關係之日常實踐。因此，博杜（Pierre Bourdieu）說「住屋（作者按：或空間）是一本書，兒童們可經由身體以學習閱讀」（Bourdieu, 1977）。事實上，這種空間的意識形態實踐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其他傳播媒介的缺乏，空間與生命禮俗、宗教儀式、歲時祭儀結合，合法化了既存的社會生產關係。而這個空間元素隨著該社會之支配性生產關係之差異而變化，如：在打獵採集的部落社會中，由於社會生活物質生產來自部落之協作，而且對自然資源的使用也以部落為單位行使之，個別的家庭只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單位，部落才是支配性生產組織，因此，領域（territory）的空間象徵便成了這種社會的支配性意象意識形態機器，將他們的宗教神話定位於空間之中（或更正確地說，把空間神格化），以維繫社會關係再生產（註6）。在農民社會中，由於其特殊生產方式，把土地當成勞動工具（instrument of labour），即：對土地之勞動力的投入期待的卻是一個「延遲的」收穫，這種特殊的生產特性造成產品累積、儲存、與分配經理之必要性，而形成了一個層級性社會。在這個層級中，祖先有恩於現世人，長者尊於幼者，因為作物之種子由他們傳下來（Meillassoux, 1978b:160-161），同時生活的地域知識（local knowledge）也累積在他們身上。更由於在這種社會中支配性生產關係是以家戶（household）為單位組織起來，也因此土地分屬不同家戶所有。此時，住屋的空間形式便成為維繫這種社會關係的關鍵性意識形態機器的傳達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居住理想型（ideal type）的三合院，其空間的尊卑與空間使用者之社會階層性之對應關係：祖先牌位居中，左尊右卑，大房（兄長）在左，次房（弟幼）在右。至於其他農民社會中的住屋，如羅伯·松頓（Robert Thornton）研究之易洛克的空間（1980），安德魯·圖頓（Andrew Turton）調查之泰族住宅（Turton, 1980），馬克·荷伯特（Mark Hobart）分析的巴里島住屋（Hobart, 1978）等都在都顯示出空間「在社會中之基本角色是一個政治與社會的工具」（Guidoni, 1978:9）用來維持既存之社會秩序。因此「把建築之視野擴大到空間概念與社會功能，吾人因之強調了積極詮釋實質環境的建築性質（architectonic quality）、空間模型作為社會結構與建物類型之中介意義、與隱藏在建築組織底下屬於民族歷史、神話遺產之象徵意義」（Guidoni, 1978:14）。當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家戶除了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單位外，已然失去了作為經濟生產單位之意義，同時也由於其他「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強化，空間逐漸喪失了維持社會再生產之意識形態日常實踐的積極整合功能。剩下的是世界體系下之民族國家間的中心——邊陲依賴關係與民族國家

內部之階級矛盾。因此，空間僅消極地反應這種資本運作國際化的邏輯與民族國家內部不同利益團體間之抗衡，而表現在區域空間結構與都市形式上。（Castells, 1983；Massey, 1984）

從上面曲折的討論，我們已可指出「文化」這個觀念其實僅只是一個籠統的人文主義的觀念，僅僅說明人與其他生物，以及不同社會間的差異。當其作為結構社會意義之「價值體系」指涉時，不足以說明這個「價值體系」與該社會存在之物質基礎間之關係；當其作為「生活方式」指涉時，不足以說明該社會運作時之不同功能層面間之結構性關係；當其用來剖析「藝術」與空間建構時，又不足以說明這些產品與社會結構再生產的關係。因而，不足以成為知識性研究的理論工具。相反地這個觀念若由意識形態、生產方式、生產關係…等概念取代時，更可具體地說明這些社會中不同功能之上、下層結構的特殊運作與接合，並從而可討論該社會之空間建構在社會生產與再生產之意義。

安東尼·金大概也察覺了這個缺失，因此，在其所編的《建築物與社會》（1980）中就逐漸地放棄了「泛文化論」的觀點，而轉從作為社會控制之社會機構（或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來研究建築類型與社會變遷之關係（註7）。這種研究方法隱然受到米修·福寇（Michel Foucault）之影響，並且已然具有政治經濟學取向之雛型。

在《小別莊》（1984）一書中，安東尼·金將英國統治者在殖民印度時期，從印度Bengal地區之民居發展出來的新居住形態，視為一個社會與政治象徵。並從政治經濟學之角度來討論：這種住宅類型如何隨著對殖民地之剩餘價值榨取所形成的資本積累而流回英國，成為當時不列顛之布爾喬亞階級、以至於後來之中產階級海邊遊樂區假日別墅的典型。後來又如何隨著英國海外殖民擴張的脚印散佈於北美、北非、澳洲、甚至全世界，成為現代小住宅之胚芽。安東尼·金由於受到當代批判理論空間研究的影響，在此書中，一方面採取了華勒斯坦之世界體系，視當今的城市為一「全球尺度的都市化」；並受卡斯提爾等人影響，把空間建構視為「營造環境的社會生產」，以探討特殊經濟類別，或生產方式與其伴隨之意識形態如何促成特殊機構（制度）和活動之興起，從而體現在都市與建築的形式中」（1984:5）。總之，他把空間視為「社會再生產過程的一部份」（1984:5），來檢視：

1. 歷史上或當代大尺度的郊區化（suburbanization）。
2. 『雙住宅』（dual residence）或『第二家』（

second home)，不管是地理位置的「季節性郊區化」，或經濟的地產所有權和資本累積所造成之遊樂區開發。

3. 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經濟與政治體系，與地產所有權，以及其在營造環境上所造成之特殊居住和聚落類型的關係。

4. 全球尺度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過程對都市居住形式之影響。」(King, 1984: 8-9)

在這本書中，由於其細緻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一個研究都市形式與建築類型的新取向。

註 釋

註1：參見David Watkin, The Rise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Lond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80, p.ix, 作者舉出F.H.Carr在其“What Is History”中所謂的「歷史家作為一個主體，也是歷史與社會之產物」，來說明建築史與建築史家所處之社會脈絡關係，更具體之說法見Janet Wolff, 1983: 15-16。

註2：原書未見，引文見Anthony King, 1976: 23。

註3：原書未見，引文見Anthony King, 1976: 34-35。

註4：在此結構指的是上述之社會過程（作者註）。

註5：參見1978年版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Macropaedia Knowledge vol.2, pp.40-41。

註6：有關這種「原始」社會空間領域之經驗性分析，可參見Enrico Guidoni, Primitive Architecture N.Y.: Abrams 1978。

註7：有一個例外，就是本書中之最後一篇Rapoport寫〈鄉土建築與文化之形式決定因子〉仍採取「泛文化論」的觀點。

參考文獻

- Althusser, Louis
1984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Notes towards an Investigation)", in Essays on Ideology, London: Verso Edition, 1984, pp. 1-6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1970)
- Althusser, Louis and Etienne Balibar
1975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Original published in French 1968)
- Bauman, Zygmunt
1968 "Marx and Contemporary Theory of Culture", in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7(3), pp. 19-33.
- Boas, Franz
1932 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 (Originally published 1932)
- Boas, Franz
1935 "Kwakiutl Culture as Reflected in Mythology", Memories of the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Vol. 28.
-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endel, Fernand
1972-74 The Mediterranean and Mediterranean World in Age of Philip II, (2 vols.), New York: Harper & Row.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1949)
- Brendel, Fernand
1984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1979)
- Castells, Manuel
1976 "Theory and Ideology in Urban Sociology", in C.G. Pickvance (eds)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St. Martin's, pp. 60-84.
- 1980 The Urban Question,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1972)
- 1983 The City and Grassroo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os Santos, Theotonio
1970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X (2), May, pp. 231-36.
- Frank, Andre Gunder
1971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London: Pluto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85 "Time, Space and Regionalism", in Derek Gregory and John Urry (ed.) Social Relations

- and Spatial Structur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p. 265-295.
- Godelier, Maurice
- 1972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1966)
- 1977 Perspectives in Marxist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1973)
- 1978 "The Object and Method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in David Seddon (eds.)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London: Frank Cass & Company, pp. 49-12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1965)
- 1982 "The Ideal in the Real", in Raphael Samuel and Rareth Stedman Jones (ed.) Culture Ideology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Gottdiener, Mark
- 1985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Austin, Texa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Guidoni, Enrico
- 1978 Primitive Architecture, New York: Abram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Italian)
- Hajinicolaou, Nicos
- 1978 Art History and Class Struggle, London: Pluto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1973)
- Harvey, David
- 1985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atch, Elvin
- 1973 Theories of Man and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中譯本·黃應貴、鄭美能譯《人與文化理論》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1984
- 1985 "Culture" in 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p. 178-9.
- Hobart, Mark
- 1978 "The Path of the Soul: The Legitimacy of Nature in Balinese Conception of Space", in G.B. Milier (ed.) Natural Symbols in South East Asia,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pp. 5-28.
- Hauser, Arnold
- 1968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4 vols) Vol. 2,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1951)
- Kroeber, Alfred L.
- 1952 The Nature of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3 Anthropology: Culture Pattern and Process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3)
- Macherey, Pierre
- 1980 Theory of Literature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1966)
- Maine, Sir Henry Sumner
- 1875 Lectures on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Holt.
- Massey, Doreen
- 1984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 Meillassoux, Claude
- 1978a "'The Economy' in Agricultural Self-sustaining Societie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in David Seddon (eds.)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London: Frank Cass & Co., pp. 127-5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1960)
- 1978b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Peasantry: The Economic Basis of Kinship", in David Seddon (eds.)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London: Frank Cass & CO., pp. 159-17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2)
- 1978c "Kinship Relation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David Seddon (eds.)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London: Frank Cass & Co., pp. 289-33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1964)
- Morgan, Lewis H.
- 1877 Ancient Society, New York: World Publisher.

- Park, R.E., E.W. Burgess and R.D. McKenzie
1967 The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5)
- Pickvance, C.G. (eds.)
1976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Ritzer, George
1983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 Rapoport, Amos
1969 House Form and Cultur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 Rudofsky, Bernard
1964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 Saunders, Peter
1981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 Steward, Julian
1972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55)
- Teymer, Necdet
1984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Physical Surroundings", in Enric Pol and Josep Muntanola (ed) Man-Environment Qualitative Aspects, Barcelona: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pp. 230-6.
- Thornton, Robert
1980 Space Time and Culture among the Iraqw of Tanzani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urton, Andrew
1980 "The Thai House: Domestication of Ideology",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Quarterly, 12(2), pp. 4-11.
- Vazquez, Adolfo Sanche
1973 Art and Society, London: Merton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Spanish 1965)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tkin, David
1980 The Rise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London: Architectural Press.
- White, Leslie
1949 The Science of Culture: A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Grove Press.
-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ttfogel, Karl
1981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57)
- Wolff, Janet
1983 Aesthetics and Sociology of Ar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4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Ar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1)

